

中文版导读

本书对比战前和战后各不同时段的农业发展，以分析农业制度、政策以及技术水平差异如何影响中国农业（尤其是粮食）产量的增长与波动。本书最大特色是作者编制涵盖全国的综合性量化指标“气候指数”（weather index），用以分解旱涝等自然灾害对农业产量的影响程度；并据以判定农耕技术，包括灌溉排涝设备和化学肥料使用，以及农村制度和国家政策对稳定产量所发挥的相对作用。

研究跨越六十年光景，以技术水平和农业制度（和政策）异同区分对比阶段，如1931–1937年（佃农/自耕农时代，传统式农耕，技术相对落后），1952–1958年（逐步集体化，统购统销制，技术水平基本上类同三十年代），1970–1977年（极端集体/公社化控制方式，大规模劳力动员，逐渐建成有效排灌工程体系），1978–1984年（去集体化，但旱涝保收耕地面积已大幅提高），以及改革开放后农村体制渐趋定型的1985–1991年（废除统购，代之以基于市价/议价合同收购制）。对最后这一时段的分析显示了在中国农村加速“市场化”与“货币化”之下，农民经济行为如何影响农业稳定性，但农业技术进步已具备一定实力，足以对冲减缓气候变异导致的产量波动，使当今中国农业迥然有别于战前或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。

本书详尽分析对比在各个特大旱涝年份，旱涝如何导致中国农业大动荡，如1931年、1954年和1991年的江淮大水，以及1934年、1959–

1960 年和 1972 年的华北旱灾；也设法解析气候特佳的 1955 年、1958 年以及 1982–1984 年的特大丰收中，国家政策好坏的相对作用与影响。抗日战争非常时期从略；1959–1969 年多个年份数据欠缺，也从略。然而，书中仍多处涉及大跃进/大崩溃的 1959–1961 年这三个特殊年份，并设两个独立章节，集中破解大跃进时期（1958–1960 年）“政策失误”与“自然灾害”的交叉作用如何导致大面积的歉收和饥荒。在分析中更直接利用各大产区当年（1958–1961 年）的雨量资料，与 30 年代的可比年份进行对比，以确定天灾覆盖的面积与深度。这是类似专著中绝无仅有 的研究方法。

作者原创了几个独特的分析性概念，用以概括主要结论。这包括“制度对冲”（institutional hedge）和“技术对冲”（technological hedge）。比如 1952–1958 年与 1931–1937 年对比，在集体动员（严防旧时代天灾导致的大规模逃荒）、排涝抢播抢收情况下，总体播种面积与产量的“不稳定性指数”（instability index）大幅度降低，此谓之“制度对冲”效果也。又如 1970–1977 年与 1952–1958 年对比，“不稳定性指数”更为显著降低，缘起于“制度对冲”的极致强化（文革期间播种指标严格执行、公社管理下实物控制方式绝对制上市场价格行为成为不稳定性因素），以及“技术对冲”形成防灾抗灾主力（连年大小规模无偿动员搞防洪抗旱水利工程建设）。1985 年后“不稳定指数”则介于前两时段之间，这显然由于市场化和货币化后“制度对冲”渐行松懈，但“技术对冲”则已跨上一定台阶。

针对国内外学者专家广泛关注的集体化长期负面影响农耕效率问题，也就是哈佛大学莱本斯坦（Harvey Leibenstein）教授所指 X-efficiency（X-效率），作者基本上避开这一“无以名之”的效率问题；但着重指出，西方世界许多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权威学者，在过去几十年对中国农业“全要素生产效率”（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）所作的极为复杂的测算，结论都莫衷一是，令人无所适从。作者认为，对 1980 年代改革前的国情而言，中国农业的宏观稳定增长远比微观效率问题更重要。农业，尤其

是粮食生产稳定化后，才有条件谈持续性增产；就如先具备有效灌溉设备，才能增施化肥提高产量。

本书另一特色是作者累积大量战前战后统计数据，以简单明确的回归分析法，检验天灾因素与农业制度、政策以及农耕技术的变迁是如何交互作用，进而影响中国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及长期提升趋势的。全书结合制度分析与定量分析，可视为“制度经济学”的一个代表作。表述方式亦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。

综观之，全书刻画战后农村制度转型、政策调整，以及农业技术进步历程，实际上展现了中国农民艰苦奋斗，应对大型气象变异，彻底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温饱问题的辉煌史诗。不仅如此，这篇史诗实际上也描绘了中国农民如何在资金极度缺乏的条件下，奋力更生，自给自足之余，不断提供“农业剩余产品”(agricultural surplus)，以支持国家长期工业化规划。

在跋“毛泽东和中国工业化中的农业”中，作者提出三个“反题”，依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(Simon Kuznets)教授有关农业对工业化贡献的理念框架，检讨和总结自1955年毛泽东发表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》，启动长时间的农业集体化和公社化后，中国农业的发展与现代化，如何在几经周折情况下，加速国家工业化的进程。